



初级产品供给风险暴露，如何建立新平衡



日前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工作方针，从宏观、微观、结构、科技、改革开放、区域、社会等七个方面明确了基本政策框架，为 2022 年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指明了方向。会议还提出，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发展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初级产品供给保障”就是上述问题之一。

初级产品指的是人们直接从自然界获得的、尚未加工过或仅经过简单加工的产品。对普通大众而言，一谈起初级产品，人们就会想起粮食、矿产品和化石能源等。在社会生产体系中，初级产品处于社会生产的前端，为整个经济的运行提供能源、原材料和生活必需品（食物）支撑，是社会生产的基础和前提。没有了初级产品，所谓中间产品、最终产品也就无从谈起，甚至连人类社会都难以生存。正是由于煤炭、石油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人们亲切地把它们分别称作“工业的粮食”和“工业的血液”。

初级产品的特性，决定了其生产和供给高度依赖于自然禀赋条件。粮食的生产离不开耕地和相应的光照、水热条件，而矿石、能源的开采更与矿脉品质和储藏条件密不可分。中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但被众多的人口平均之后，中国又是人均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大量进口初级产品、同时大量出口制成品的独特贸易格局。从出口角度看，在对外开放初期的 1980 年，中国产品出口中初级产品占 50.3%，工

业制成品占 39.7%；到 1990 年，初级产品占比就下降到 25.6%，而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比上升到 74.4%，再到 2020 年，初级产品占比进一步下降到不足 4.5%，而工业制成品占比则持续攀升到 95.4%。从进口角度看，中国进口产品中初级产品所占比重 1980 年为 34.8%，1990 年曾下降到 18.5%，但到 2000 年又上升到 20.8%，到 2020 年又进一步上升到 33.2%。从绝对值看，从 1980 年到 2020 年，中国初级品出口从 91.14 亿美元增长到 1156.29 亿美元，增长了 11.7 倍；而初级产品进口则从 69.59 亿美元增长到 6960.07 亿美元，增长了 97.7 倍。超过 5800 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充分说明了中国高度依赖国际市场供应初级产品的客观事实。

如果说数字还有些抽象，那么分产品看，1990 年中国进口石油 756 万吨，出口 3110 万吨，净出口 2354 万吨；而到 2019 年，中国则进口石油 58102 万吨，出口 8211 万吨，全年净进口石油 49891 万吨，占当年国内石油消费总量的 77.3%。打个形象的比喻，目前中国每 4 辆燃油车中，有 3 辆车烧的都是进口石油。类似的，2020 年中国进口铁矿石 11.69 亿吨，占国内铁矿石消费总量的 90.2%；进口大豆超过 1 亿吨，是国内大豆产量的 5 倍多。

初级产品进口数量的增加，使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买方地位越来越重要。2020 年中国进口铁矿石占世界各国铁矿石出口量的 77.3%；2018/19 年度中国进口大豆占世界大豆出口量的 57%。2020 年，中国原油进口占世界各国原油出口的 1/4 强 (26.4%)；不仅如此，从增量角度衡量，中国

原油进口的增长是驱动世界原油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受疫情冲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2020年世界各国原油进口减少了1.57亿吨；而中国原油进口却逆势增长5000万吨。随着中国成为国际市场重要的“玩家”，完善相关机制以确保中国的买方权益、确保初级产品的稳定供应就变得越来越有必要。

在供需双方长期而激烈的利益博弈中，初级产品的国际贸易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交易规则，具体如：

上下游企业交叉持股使经营风险内在化；供求关系以长期合约为主；依托期货市场开展套期保值和风险管理；深入细致的信息搜集与发布；以及生产、运输、储存和加工环节有机衔接；等等。

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国是初级产品国际市场上的后来者，并没有被既有的交易网络充分接受；再加上对既有的交易规则不够熟悉，国内企业就出现了许多“不适应”，具体表现在：由于数量众多、合作意愿低，国内企业在国际谈判中议价权偏弱，难以获得与购买量相当的优惠待遇；许多企业为了获得低价优势，甚至大量采用短期现货合同的交易方式；人才不足和金融意识缺乏导致国内企业对套期保值交易利用不充分，在价格下跌时削减库存，在价格上涨增加库存，加剧了现货市场交易的波动；还有一批商人利用运输、仓储等领域的薄弱环节进行投机，在市场波动时刻意炒作以实现“火中取栗”的目的。所有这些，就使中国经济面临着来自初级产品市场的巨大潜在风险。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则使上述风险逐渐演变为现实的损失和冲击。中国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也引发了相关各方的反应。一些国家为了维护自己既有的优势地位，纷纷出台措施以“对冲”中国的影响、遏制中国的崛起。在世界力量分化重组、国际地缘政治快速演变的关键时刻，向来被视作重要战略物资的粮食、石油乃至铁矿石和有色金属矿自然难以置身事外，初级产品的国际贸易出现大幅波动势所难免。

以铁矿石为例。2020年底以来，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中国进口铁矿石价格快速上涨，并推动了国内钢铁价格第一轮明显上涨。铁矿石价格的上涨，引发了钢铁生产企业“补库存”的行为，钢铁企业纷纷增加进口以提前锁定成本；投机资本也从中嗅到了商机，试图在铁矿石价格上涨的过程中大赚一把。在需求猛增的背景下，高度垄断的国际供应商坐地起价，进一步抬高供货价格，引发了铁矿石价格的新一轮上涨，并推动着国内钢铁价格进一步上涨。钢铁价格的进一步上涨，印证了各方有关钢铁价格上涨的“预言”，坚定了钢铁生产、营销企业“补库存”的行为和投机商们“囤积居奇”的行为，并诱使部分社会游资参与其中，这反过来又强化了铁矿石供应的紧张和钢铁价格上涨的预期。直到政府出手干预（如限制钢铁产品出口），上述预期的自我循环和强化才被打破。

由于铁矿石、有色金属矿、煤炭、石油等初级产品价格快速上涨，2021年以来国内钢铁、有色、化工等上游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导致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出现了节节攀升的局面；另一方面，受市场购买力的制约，也由

于下游加工企业市场集中度较低，难以把成本上涨转嫁到最终产品价格中去，居民消费价格则相对平稳。于是，出现了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相背离的现象。到 11 月份，PPI 和 CPI 两者之间的缺口甚至达到 10.6 个百分点。

在巨大的落差背后，隐藏着的是利益分配的严重失衡：一方面，居于产业上游的大型（冶金类）企业利润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居于产业下游的诸多中小企业则面临原材料价格暴涨和市场销售疲软的双重挤压，企业经营压力空前加剧。

不仅如此，由于煤炭价格快速上涨而火电上网电价没能及时跟进调整，发电企业出现大面积亏损。为了减少经济损失，发电企业纷纷安排“停机检修”，结果导致电力供应紧张、出现频繁的“拉闸限电”，问题严重时甚至出现了“停四开三”、“停五开二”的现象，严重地干扰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使许多中小企业的经营进一步雪上加霜。初级产品供应的风险已经充分展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大量进口初级产品、出口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格局是中国利用两个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5688

